

美国“9·11”小说中自我与他者的伦理身份分析

Ethical Identity of Self and Other in American 9/11 Novels

王 薇 (Wang Wei)

内容摘要: 近年来, 美国“9·11”小说在叙事主题上发生转向, 从对灾难和创伤进行同质化再现书写, 转变为对异质个体间的伦理关系和集体需承担的伦理责任进行反思式探究。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下, 《坠落的人》《特别响, 非常近》《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等美国“9·11”小说, 以受害自我与施暴他者的“相遇”作为伦理事件、展现二者在伦理选择的过程中不断演变的伦理关系、随之新确立的伦理身份以及伦理责任。上述伦理叙事主线表明, 美国“9·11”小说对自我和他者的伦理身份书写已不再囿于“非我即他”的对立逻辑, 而是对自我与他者共存语境下的伦理责任进行想象与追寻, 进而揭示了“9·11”文学在警醒当下主体对自我加以反思、履行自我趋近他者的伦理责任方面产生的教诲价值。

关键词: 美国“9·11”小说; 自我; 他者; 伦理身份

作者简介: 王薇, 青岛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美国文学及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文化记忆语境中的美国‘9·11’小说研究”【项目批号: 21FWWB018】和山东省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英语+大数据’跨学科专业建设研究与实践”【项目批号: Z2021033】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Ethical Identity of Self and Other in American 9/11 Novels

Abstract: As literary responses to 9/11 terrorist attacks, American 9/11 novels recently experiences the ongoing transition from homogeneous representation of violence and trauma to reflective depiction of ethical identity which “self” tend to take as victims and “other” as terrorists in the ear of disord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hanging ethical identity of self and other presented in *Falling Man*, *Extremely Loud & Incredible Close*, *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 and other American 9/11 novels. This paper further examines how these 9/11 novels construct a discourse of self-other encounter in which ethical identity of self and other is reformed not as enemies but as equal communities with the aim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among different ethical groups.

Thus, American 9/11 novels rely on a way of “saying” which could break the homogeneous stereotype of self and other, call on self to get closer to other, and perform the post-9/11 ethical responsibilities.

Keywords: American 9/11 novels; self; other; ethical identity

Author: Wang Wei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Her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contemporary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 wangwei@qdu.edu.cn).

他者，自种族主义盛行时期指向低劣、次等的“非我族类”，到后殖民时代指向被压迫、被边缘、力图发出反抗之音的弱势群族，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均产生了契合具体语境的他者书写。就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文学表征来说，文学伦理学批评实践主要考察在不同时期文学作品中，具有不同伦理身份的行为主体之间形成的复杂伦理关系、进行外在或内在伦理选择活动以及各方行为主体需要承担的伦理责任。“文学的任务就是描写这种伦理关系和道德秩序的变化及其引发的各种问题和导致的不同结果，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经验和教诲”（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13）。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他者是谁”的命题在新世纪再次升温，成为意识形态、思想、文化等领域讨论的热点话题。在对这场新世纪恐怖袭击事件进行文学想象的美国“9·11”小说中，他者往往被具象化为恐怖袭击的施暴者、即恐怖分子形象。《恐怖分子》《坠落的人》等“9·11”小说代表作中的典型他者形象塑造、主题呈现及叙事风格，已在国内外论著中多有论及。¹总体来看，美国“9·11”小说中的他者书写以恐怖分子形象塑造为主要特征。相较而言，这场事件中的直接受害者、或间接旁观者等叙事组成部分，成为美国“9·11”小说的另一重要面向，本文将其统称为受害自我书写。基于上述双重伦理要素，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将研究视角进一步拓宽至美国“9·11”小说中受害自我和施暴他者的伦理身份探讨。实际上，作为伦理事件亲历主体的自我与他者，经历从“相遇”而展开的伦理选择到二者伦理关系的重新确立，在美国“9·11”小说中展现出的自我与他者的伦理身份，已不再囿于“非我即他”的对立思维逻辑，而是对自我与他者共存语境下的伦理责任进行想象与追寻。

1 参见 Richard Gray, *After the Fall: American Literature after "9·11"*. Melbourne: Blackwell, 2011; Martin Randall, *9·11 and the Literature of Terror*,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1; 王薇：“《坠落的人》和《恐怖分子》中恐怖分子的伦理选择”，《外国文学研究》5（2016）：50-59；王薇：“同质见证与异质记忆：美国“9·11”小说的两次‘言说’”，《外国文学研究》2（2022）：157-165等。

一、自我与他者的“相遇”事件

借用海德格尔的“相遇”¹概念来看，在美国“9·11”小说之中，“9·11”恐怖袭击事件被表征为事件亲历者、旁观者的受害自我与作为发起恐怖事件的施暴他者之间的“相遇”时刻。发生在2001年9月11日这场突如其来的相遇事件，凭借其唤起的震撼、恐怖等灾难情感，更凭借其得到全球即时直播的传播方式，在每一个或介入其中、或在外旁观者心中，都产生了不断复现的事件记忆。美国“9·11”小说以虚构方式描摹自我与他者的相遇，使得美国“9·11”小说在本质上凸显出深刻的伦理意蕴：在自我与他者相遇时刻，自我有机会寻得反思当下思维方式的重要参照系，这也为自我思索伦理旧秩序的失衡、伦理新秩序的重建提供了契机。

由于“9·11”事件突发性和不可预见性，在美国“9·11”小说中的自我与他者相遇时刻的描摹，多以自我作为亲历者或旁观者的幻想形式进行文学呈现。“伦理选择活动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外在的选择活动，一种是内在的选择活动。外在的伦理选择活动主要是一个人如何为人和处世的选择，并通过为人和处世的选择范例提供教诲；内在的伦理选择活动通过人的心理活动过程中表现出来。内在的伦理选择活动和外在的伦理选择活动往往交织在一起”（聂珍钊，“伦理选择概念的两种涵义辨析”（21-22））。据此观照美国“9·11”小说的“相遇”书写，实质上更多作品展现的是自我与他者相遇幻想的叙事主体在这一伦理时刻所做的内在伦理选择。例如，下面这段出自乔纳森·弗尔小说《特别响，非常近》的自由间接引语，便是在“相遇”时刻，自我进行内在伦理选择的典型文本。小说中，主人公奥斯卡是一名九岁少年，他的父亲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中不幸身亡。在悲剧发生两年后，奥斯卡登上帝国大厦顶楼，想象着父亲在“9·11”事件中遇袭身亡的时刻，并运用现实回忆与虚构想象相结合的方式，想象着与劫机者有一场面对面的“相遇”：“我想象着最后一秒钟：看得见飞行员的脸，飞行员是个恐怖分子。我想象着，当飞机的机头离大楼只有一毫米的时候，我们彼此能看见对方的眼睛”（弗尔 250）。“伦理身份是评价道德行为的前提”（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264）。在上述描写中，奥斯卡的伦理身份是一名在灾难中失去父亲的受害者，与驾驶飞机撞上大楼的恐怖分子他者形成敌对的伦理关系。因此，在幻想“相遇”的时刻，奥斯卡将恐怖分子置于面前，用眼神向他者传递着愤怒和仇恨的情感。由此，作家弗尔以通感的方式，将这一剑拔弩张的自我与他者直面对抗的瞬间加以凝固。在“9·11”小说对自我和他者“相遇”的想象性叙事中，这一片段成为自我与他者直面对

1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认为，人与世界的相遇具有实用性——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工厂，每个人都在努力寻找一个地方，作为一个介入其中的人、而不是一个旁观者被卷入这场相遇之中，参见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

方、直抒仇恨的典型段落。

与幻想自我在恐怖袭击的时刻与恐怖分子他者进行面对面的对峙相比，想象施暴他者将会再次来袭，是“9·11”小说对“相遇”时刻的描摹中更有恐怖氛围、也更具伦理意图的叙事内容。同样选择以儿童作为叙述者，相较《特别响，非常近》中奥斯卡想象直面他者的相遇时刻，德里罗小说《坠落的人》中的男孩贾斯汀，在对“他-我”相遇时刻进行想象性叙述时，明显展现了时序颠倒和事实错位，试图在对未来的恐怖幻想中预测危险的即将再次来临，这实际上体现的是自我与他者对立伦理身份制约之下的应激性内在伦理选择。小说中，在“9·11”事件发生之后，贾斯汀和他的小伙伴们一起，秘密地使用望远镜搜索天空，坚持认为“双子塔没有倒”（德里罗 250），并且他们将在电视上听到的“本·拉登”（Ben Laden）改名为“比尔·沃顿”（Bill Warton），并认定比尔会驾驶飞机再次来袭：

“整个事情是”，他[儿子贾斯汀]说，一板一眼，带着挑战的口气，“他[比尔·沃顿]说了关于那些飞机的事情。我们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来，他说他们要来。可是，我能说的就是这些。他说，这回双子塔会倒塌。”

“双子塔已经倒塌了。这你是知道的，”她[母亲丽昂]轻声说。

“时候到了，他说，它们真的会倒塌。”（德里罗 109）

孩子们时序错乱的幻想中既有自我与他者的直面交流，也有自我聆听他者之言的笃信与执着。这个由儿童编造的“他者必将再次来临”的童话，终究会以双子塔遭受“最后的黑暗攻击”这一事实所终结。相比奥斯卡直面恐怖分子、传递仇恨情绪的相遇时刻，贾斯汀幻想这个时序错乱的“相遇”过程，象征了面对后“9·11”伦理混乱局面的复杂而纠结的大众心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中众多个体的伦理身份，无论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父亲与儿子的身份，还是以道德规范为基础的良善之人与邪恶之人的身份，在“9·11”事件发生的瞬间，个体的伦理身份产生了固化，成为“9·11”事件中受害自我或施暴他者两大敌对阵营的一员。

由此可见，美国“9·11”小说中的自我与他者的相遇，实则展现的是已然具有固化伦理身份的敌对主体之间相遇的伦理时刻。本质而言，此类相遇时刻的叙事逻辑，依然延续了企图化他者为自我的传统伦理关系书写样式。然而，在后“9·11”语境中，受害自我与施暴他者这敌对双方之间在相对固化的伦理身份制约下，无法实现同一与转化，这使得“相遇”时刻成为一场失序伦理事件。美国“9·11”小说对这一失序伦理事件的描摹，既运用文学虚构的方式将他者“面孔”呈现在读者面前，又启发读者以文学想象的方式体认“面孔”、呼唤无论自我还是他者的主体进行相应的伦理身份转化。通

过营造自我与他者相遇的伦理契机,美国“9·11”小说为二者通过凝视彼此的“面孔”、进而为履行后“9·11”时代不同主体的伦理责任创造了条件。

二、自我与他者的交叉“面孔”

“纵观人类发展历史,人认识自己主要采用的是以‘他者’为参照展开辨识或划出边界的方法”(杨革新 420)。美国“9·11”小说中,在自我与他者相遇的伦理时刻,施暴他者来到受害自我面前,展现出受害自我作为伦理主体,通过凝视作为参照物的他者“面孔”、进行伦理选择活动的行为开端。小说家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曾在《小说的两条路径》一文中指出,早期“9·11”小说亦可称之为“后灾难小说”,只是这场灾难“并非恐怖,而是现实”(Smith, “Two Paths for the Novel”)。诚然,在全球媒体的广泛传播之下,突如其来的恐怖主义灾难成为受众甚广的眼前现实,而恐怖分子的“面孔”则成为这场事件的传播中众人具体可感的恐怖形象。无论是在媒体报道中还是在文学虚构作品中,从西方观者自我的视角出发,施暴他者的“面孔”都具有相对统一的典型人物特征——蓄胡须的、目光凶残的男性穆斯林形象。在文学创作领域,如何摆脱固化的受害自我与施暴他者的敌对伦理身份、打造新型伦理关系,成为美国“9·11”小说的集体创作难题。

“后殖民作家往往会选取重大历史事件的特定‘伦理时刻’来阐发个人的政治伦理观,后殖民文学可以成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重要研究对象”(聂珍钊 王松林16)。实际上,后殖民文学的伦理特质,可以被归纳为殖民前后经历伦理身份转变的主体,依据变化了的伦理身份,在一定的伦理时刻进行相应伦理选择的戏剧化过程。若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切入具有后殖民文学特质的美国“9·11”小说,可以发现,《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恐怖分子》等围绕穆斯林移民展开的叙事作品,正是避开“非我即他”的二元对立思维,书写同时具有受害自我和施暴他者双重伦理身份的移民主体进行伦理选择的有效尝试。在此类穆斯林移民小说中,无辜的、一心融入美国社会的穆斯林移民,在“9·11”事件之后突如其来地、被迫无奈地成为美国公众眼中的施暴他者,陷入“我究竟是谁”的伦理困境。与前文所述《坠落的人》《特别响,非常近》等小说集中书写典型受害自我与施暴他者的敌对相遇形成鲜明对照,《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着眼于身处自我与他者伦理身份交叉点上的穆斯林移民,以其不同阶段由于伦理身份制约或影响下作出的不同伦理选择为情节发展进程,成为美国“9·11”小说凸显别样自我与他者伦理关系的代表文本。

《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中,作家莫欣·哈米德选择从穆斯林移民视角切入“9·11”恐怖袭击事件前后,描述了一名怀揣美国梦的巴基斯坦青年昌盖兹,在纽约大都市中寻梦、迷失、惊醒、归乡的人生历程。整体而言,主人公昌盖兹主要经历了两次关键的伦理选择——“来到美国”和“离开美

国”。¹表面上看，昌盖兹决意“来到美国”并倾其所有努力融入美国，是其伦理身份从巴基斯坦青年转变为美国追梦人的必然选择，而其“离开美国”的选择，是其在“9·11”事件后骤然成为公众眼中的施暴他者的伦理身份所迫的无奈结果。实际上，两次伦理选择是昌盖兹在旧巴基斯坦身份和新美国身份这双重伦理身份的交织与博弈的过程中，主体冲出伦理困境的艰难选择。由是观之，《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在展现穆斯林移民作出无奈而纠结的伦理选择过程中，通过描摹穆斯林移民人物内心“是我还是他”的内在伦理选择活动，将伦理主体的同时兼具自我与他者的交叉“面孔”呈现在读者面前，并且对不同族群间复杂伦理关系进行深入考量。

具体而言，身为普林斯顿大学高材生的昌盖兹的第一次伦理选择是“来到美国”——他力图摆脱旧世界、迈进新世界，努力寻找一条身在美国、心在美国的伦理身份重新定位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次伦理选择的进程中，昌盖兹的美国精英移民伦理身份并不是单一存在，而是在其旧有的巴基斯坦母国身份相参照中不断地产生内心挣扎与矛盾。小说中，在“9·11”事件发生之前，昌盖兹便感受到了外界环境的变化对他产生的巨大影响。在菲律宾，“一个吉普尼司机也正在瞪着我看。在他的表情中有一种毫不掩饰的敌意”（哈密德 61），但昌盖兹的巴基斯坦自我随即意识到，“作为潜意识中的出发点——他和我都有一种‘第三世界的敏感性’”（哈密德 62）。也就是说，昌盖兹的“潜意识中的出发点”，落脚在自己巴基斯坦母国身份，因此纵然在充满敌意的眼神中，昌盖兹却和菲律宾司机产生了某种同属“第三世界”的情感纽带。然而，面对金发碧眼的美国同事时，昌盖兹的巴基斯坦自我的声音不断响起：“我望着他[同事]，心想‘你太外国了’。在那一刻我突然感到自己和那个菲律宾司机要比和他距离更近；我突然感到自己正在做的一切都是在演戏”（哈密德 61）。正如昌盖兹的自我剖析，“演戏”实则他刻意掩饰巴基斯坦母国身份、扮演美国自我身份的外在伦理选择活动。昌盖兹在回首美国往事时，以回顾性视角对自己在第一次伦理选择过程中的“演戏”活动进行觉察和反思，更加体现出主人公内心深处对巴基斯坦和美国双重伦理身份之间的矛盾、博弈与较量。

“来到美国”、决意成为美国自我的穆斯林移民，却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被迫成为他者，不得不转变自己尚待确立的美国伦理身份，无奈进行第二次伦理选择活动——“离开美国”。在《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中，如果说昌盖兹依靠“演戏”活动实现第一次伦理选择的话，那么看似迈进了光明世界的昌盖兹，却在经历了“9·11”事件之后的被排斥、被敌视之

1 布鲁斯·罗宾斯提出新世纪美国小说的两大叙事图式“来到美国”和“离开美国”：“‘他国’的他者来到美国，前提是‘他国’意味着荒诞与暴虐，而他们离开美国，目的是为了挣脱资本主义体制和传统的束缚”，参见 布鲁斯·罗宾斯：“美国小说的世界性”，余莉译，《外国文学》1（2010）：92-101。

后，最终选择回到故乡巴基斯坦，以“不再演戏”的方式寻得了内心宁静。小说中，在返乡探亲之旅即将结束时，“尽管母亲请求过我，我自己也知道这会在入境口给我带来多大的麻烦，可我还是没有把留了两个星期的胡子给剃掉”（哈米德 119）。在后“9·11”时代，作为穆斯林男子的外貌特征之一，胡须，已被妖魔化为恐怖分子或疑似恐怖分子的外在标识。在昌盖兹的巴基斯坦自我判断中，“我只知道我不想把自己混同在我的同事们——一群脸刮的干干净净的年轻人——中间，在我的体内，出于许多种原因，有一股怒火在燃烧”（哈米德 119）。从“留下胡须”这一举动来看，昌盖兹的巴基斯坦自我果断舍弃了美国化的处事方式，转而以直面巴基斯坦自我的伦理选择，寻求发自内心的、对自我伦理身份的重新认识：“这对我来说也许算得上是一种抗议的形式，一种身份的象征，又或许我是想竭力让自己不要忘记我刚刚抛在了身后的现实”（哈米德 119）。从昌盖兹蓄起胡须、离开美国的伦理选择活动来看，面对被迫成为他者的伦理困境时，移民主动转变为曾经的母国伦理身份。由此，美国“9·11”小说中展现的穆斯林移民伦理选择过程，从被迫无奈接受他者身份，到主动积极地寻求自我伦理身份的转变，使惯常的自我与他者的敌对阵营逐渐消弭，他者“面孔”不再是凶残、暴力的刻板印象，而是在叙事情节的发展中、活灵活现的人物塑造中，呈现出兼具理性与情感的后“9·11”主体形象。

简言之，《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充分展现了在东西文明冲突愈发激烈的伦理环境中，穆斯林移民面临着的“来到美国”与“离开美国”等伦理选择。一般而言，作为美国社会内部的他者，后“9·11”时代的穆斯林移民的命运与深陷“内部殖民”伦理语境的早期移民一致，“选择认同强势族群的价值观念，或是选择拒绝，这是‘他者’必须面对的伦理选择”（何卫华 536）。只是在后“9·11”语境中的“强势族群”，实则指的是对普通他者（穆斯林移民）和绝对他者（施暴的恐怖分子）并不加以区分、而是一味谴责的主流认知群体。美国“9·11”小说将后“9·11”语境中的他者“面孔”，从媒体话语中的扁平形象转变为文学叙述中的丰满形象，着重展现在“相遇”时刻普通他者的伦理选择，进而反思如何重识他者、如何言说自我与他者的伦理责任等新世纪伦理问题。

三、自我与他者的伦理责任

“在现实中，伦理要求身份同道德行为相符合，即身份与行为在道德规范上相一致”（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4）。如前所述，在美国“9·11”小说展现自我与他者的伦理关系中，二者的伦理身份也在动态演变中不断博弈，二者的伦理选择如何既与道德规范相一致、又符合彼此间的伦理责任？这成为具有时代责任感的作家们的集体创作诉求。在《别样与存在》中，哲学家列维纳斯强调自我在“他-我”伦理关系中的“趋近”责任，

指出自我向他者履责的本质方式是“言说”，即“言说要求主体在面对他者面孔的时候，必须朝向它、凝视它，自我必须向他者趋近”（Levinas 6）。结合文学伦理学批评与列维纳斯的伦理主张，下文将以《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为例，具体分析美国“9·11”小说中自我趋近他者的伦理叙事方式。从叙事结构上看，《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具有内外双层叙事结构：在小说的内层叙事中，主人公昌盖兹在回顾美国往事时，叙事主体分裂为“现在的我”和“过去的我”两个部分，由此形成“现在的我”和“过去的我”之间的对话叙事；在小说的外层叙事中，作家哈米德将叙事形式设计为在拉合尔的茶馆中，主人公昌盖兹“我”向一位陌生的美国人回顾自己的美国经历。从“言说”责任来看，《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以内外双层叙事结构，实现自我向他者进行无条件“言说”，履行自我趋近他者的伦理责任。

具体来看，在小说的内层叙事框架中，叙述主体在分裂为“现在的我”与“过去的我”双重主体之间形成对话，主体内心对将“现在的我”视为自我表述的对象，将“过去的我”视为曾经的他者，二者通过相互审视形成由疏离、对抗到对话、沟通的自我与他者之间新型伦理关系。《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中，“9·11”恐怖袭击事件的爆发成为昌盖兹美国往事的重要转折点，整部小说也以“9·11”事件为分水岭，内层叙述中昌盖兹的“现在的我”对“过去的我”的认知，也在“9·11”事件前后发生了明显转变。小说中，身在菲律宾的昌盖兹，在电视新闻报道中看到“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影像。昌盖兹以“现在的我”聚焦“过去的我”在那一刻的感受：“我的第一反应是笑了起来”（哈米德 66）。昌盖兹“现在的我”随即对“过去的我”在面对“9·11”事件惨绝人寰的场面竟然感到些许开心的原因进行剖析：

在当时，我的思绪还没有集中到那些攻击受害者们身上，吸引我注意的是整件事的象征意义：有人用如此明显的方式让美国弯下了膝盖，但为什么部分的我想要看到美国受到伤害呢？当时我说不出个中的缘由。（哈米德 67）

诚如昌盖兹自白中的最后一个句子“当时我说不出个中的缘由”，“过去的我”在美国经历的“演戏”活动所感受到的分裂感，让昌盖兹不能为自己本就混乱的伦理身份进行清晰定位。然而“9·11”事件的发生，却可以让昌盖兹在确立伦理身份的过程中清楚地感受到出乎意料的“第一反应”。此种可谓无条件“言说”的“第一反应”，为“过去的我”在随后作出“离开美国”的伦理选择埋下了伏笔。

在小说的后半部分，“9·11”事件后返回故乡的昌盖兹，感受到了深深根植于自己内心深处的巴基斯坦身份的认同之感，并以对照的眼光对自己穿

梭往复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进行着反思。“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不再对立、分裂，而是呈现出交流与对话的态势，自我向他者趋近的伦理意图愈加明显。例如，昌盖兹在反思过去的所作所为时，“现在的我”常以换位思考的方式，站在“过去的我”的角度，找寻曾经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我当时想为自己在纽约建立起一种新生活，现在我在想，先生，我当时是否真的以为这种新生活的基础是牢固的。当然我想要这样认为，至少我强烈地不愿意去怀疑，所以我尽量不让自己在周围世界的崩溃和我个人即将毁灭的美国梦之间建立起显而易见的联系。自我麻痹的力量如此之大令我感到震惊。（哈米德 85）

正如此段引文所见，在小说的内层叙事中，昌盖兹始终站在过来人和旁观者的角度回忆自己的美国经历，清醒地审视“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之间存在的差异，并不时地将两者勾联起来，让“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形成对话。此段中“我当时想（……），现在我在想（……）”等诸如此类的自我与他者不断相互审视的句式在全书高频重复，以此不难看出，在拉开了时空距离之后，“现在的我”与“过去的我”对美国往事的判断也出现了差异。昌盖兹内心记忆中充满矛盾与张力的对话，凸显了叙述主体不断进行自省，由此实现了主体内部自我趋向他者的无条件“言说”。

在小说的外层叙事框架中，昌盖兹始终作为言说者，向一位沉默的美国陌生人诉说自己的美国往事，作家哈米德选择以此种方式让昌盖兹作为被迫成为施暴他者的代言人。小说中，在向美国听众的讲述中，作为穆斯林移民，昌盖兹的“言说”声音坦诚无畏、直白明了，反观在外层叙事结构中一直身处“黑暗”角落、始终保持沉默的美国听者，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全部通过昌盖兹的转述或引述，从而被塑造为无言的、或者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名隐身的听者。作家哈米德曾在访谈中表述《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的叙事效果：我想让小说成为一面镜子，这面镜子也为美国与巴基斯坦，或者说整个穆斯林世界映照出彼此之间的猜忌，为敌对双方能顺畅地沟通搭建一座桥梁。¹由此可见，作家将原本沉默的穆斯林移民设置为言说者，反将原本拥有言说权力的美国陌生人设置为沉默听者，由此制造了一面与众不同的、映照出不同自我和他者的“镜子”，使具有不同身份的伦理主体在文本中无条件相互映照、彼此“言说”，以此实现了二者相互趋近的伦理责任。

总之，《拉合尔茶馆中的陌生人》凭借对穆斯林移民和美国听者之间无条件“言说”的有力整合，持续展现出虚构小说中自我和他者在履行伦理责

1 参见 Hamish Hamilton, “Interview with Mohsin Hamid,” Hamid’s Official Website. 14 February 2007. Available at: <<http://www.mohsinhamid.com/interviewhh2007.html>>. Accessed 22 May 2013.

任方面所做的积极尝试。在列维纳斯看来，在自我与他者的伦理关系之中，言说者必须无保留地真诚地袒露与不私藏地奉献一切。《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中，在昌盖兹对自己美国往事的潜意识重述中，他不仅以检视过去的“第一反应”实现对真实自我的无条件“言说”，还以毫无保留的“言说”方式向美国听者袒露自我，不以掌控、同化他者为目的，而是勇敢地以尊重他者的方式，履行着后“9·11”伦理语境中自我趋近他者的伦理责任。

近年来，美国“9·11”问题研究者詹妮·埃德金斯（Jenny Edkins）致力于“9·11”事件遗产的探究，严厉谴责了以布什政府为代表的官方话语存在“毫无心理顾忌地压抑创伤”等问题。¹本文论述的美国“9·11”小说，通过文学想象创造自我与他者的相遇时刻，形塑自我和他者双方眼中的彼此“面孔”，展现个体自观与族群互观的多样文学表达，正是埃德金斯积极称赞的、不同于官方话语的“那些坚持阐释创伤所造成空白的艺术尝试”（Edkins 99）。于是，在美国“9·11”小说自我与他者的伦理书写中，“他是谁”的故事，“我是谁”的故事，渐渐汇入不同主体的伦理选择过程之中，成为每个主体进行伦理身份重新认知的一部分，同时也鲜明地体现出自我与他者相互召唤、相互言说并各自承担起伦理责任的整个过程。在《坠落的人》《特别响，非常近》受害者儿童自我幻想与恐怖分子他者的相遇时刻中，在《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穆斯林移民“不情愿地”从努力融入美国的自我变成了一名疑似恐怖分子他者的伦理选择中，美国“9·11”小说中自我与他者的伦理书写不断让那些被刻板印象遮蔽的、被误解扭曲的、被文化记忆固化的沉默他者发出声音。同时，美国“9·11”小说也在警醒自我再次思考，如何应对他者的召唤、如何履行自我趋近他者的伦理责任。如果当下的伦理主体都不再迷恋“眼见为实”，而是以“后见之明”指引未来自我与他者的相互观照，便是美国“9·11”小说自我与他者伦理书写的教诲价值所在。

Works Cited

唐·德里罗：《坠落的人》，严忠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

[DeLillo, Don. *Falling Man*, translated by Yan Zhongzhi. Nanjing: Yilin, 2010.]

Edkins, Jenny. “Remembering Relationality: Trauma Time and Politics.” *Memory, Trauma, and World Politics: Reflection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edited by Duncan Bell.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99-115.

乔纳森·弗尔：《特别响，非常近》，杜先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Foer, Jonathan Safran. *Extremely Loud and Incredibly Close*, translated by Du Xianju.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ress, 2010.]

¹ 参见 Jenny Edkins, “Remembering Relationality: Trauma Time and Politics,” *Memory, Trauma, and World Politics: Reflection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edited by Duncan Bell,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99-115.

- Gray, Richard. *After the Fall: American Literature after "9 • 11"*. Melbourne: Blackwell, 2011.
- 莫欣·哈米德:《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吴刚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
- [Hamid, Mohsin. *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 translated by Wu Ga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2009.]
- Hamilton, Hamish. "Interview with Mohsin Hamid." Hamid's Official Website, 14 February 2007. Available at:
<http://www.mohsinhamid.com/interviewhh2007.html>. Accessed 22 May 2013.
- 何卫华:“族群伦理与文学中的共同体形象”,《文学跨学科研究》3(2022):533-545。
- [He Weihua. "Ethnic Ethics and the Imagined Communities in Literatur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3 (2022): 533-545.]
- Levinas, Emmanuel. *Otherwise than Being: or, Beyond Essence*, translated by Richard A. Cohen. Pittsburg: Duquensne UP, 1985.
-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 聂珍钊:“伦理选择概念的两种涵义辨析”,《外国文学研究》6(2022):15-25。
- [Nie Zhenzhao. "Analyzing the Implications of Ethical Selection and Ethical Choic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 (2022): 15-25.]
-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 [—,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聂珍钊、王松林编:《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 [Nie Zhenzhao and Wang Songlin, eds.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Theoretical Study*. Beijing: Peking UP, 2020.]
- Randall, Martin. *9 • 11 and the Literature of Terror*. Edinburgh: Edinburgh UP, 2011.
- Smith, Zadie. "Two Paths for the Novel."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0 November, 2008. Available at: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2008/nov/20/two-paths-for-the-novel>. Accessed 13 June 2012.
- 王薇:“《坠落的人》和《恐怖分子》中恐怖分子的伦理选择”,《外国文学研究》5(2016):50-59。
- [Wang Wei. "Ethical Choices of Terrorists in *Falling Man* and *Terrorist*."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5 (2016): 50-59.]
- :“同质见证与异质记忆:美国“9•11”小说的两次‘言说’”,《外国文学研究》2(2022):157-165。
- [—, "Homogeneous Witness and Heterogeneous Memory: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9 • 11' Novel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2): 157-165.]
- 杨革新:“从伦理选择到科学选择: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逻辑”,《文学跨学科研究》3(2022):416-425。
- [Yang Gexin. "From Ethical Selection to Scientific Selection: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3 (2022): 416-425.]